

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

彦 奇 主编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

曹健民 杨炎和 杨 虹 编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

彦奇 主编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

曹健民 杨炎和 杨虹 编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曹健民等编写。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彦奇主编)

ISBN 7-300-02014-3/K · 207

I. 中...

II. 曹...

III.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

IV. D6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2856 号

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

彦 奇 主 编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

曹健民 杨炎和 杨虹 编写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丰台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125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1 000 册数: 1-1 500

定价: 3.4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	(1)
一、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中间党派的初步结合	(1)
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及其十大纲领	(12)
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的建立	(18)
四、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 政运动	(25)
五、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改组及其地方组织的发展	(38)
第二章 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和平建国纲领，并为坚持 政协路线而斗争	(44)
一、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平建 国方案的制定	(44)
二、中国民主同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坚持政协路线	(54)
三、西安血案和李闻血案	(62)
四、中国民主同盟在停战谈判中的调停作用。民盟拒绝参加 伪国大，否认伪宪法	(76)
五、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坚持恢复政协 路线	(80)
六、中国民主同盟在民主运动中的艰苦奋斗，民盟被迫 解散	(88)
第三章 中国民主同盟的新生，民盟积极参加筹建新 中国	(101)
一、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民盟历史的转 折点	(101)
二、中国民主同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新政 协运动	(111)

三、中国民主同盟揭露美蒋反动派的和平阴谋，支持中 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	(116)
四、中国民主同盟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 的建立	(122)

第一章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 成立及其主要活动

一、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 中间党派的初步结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即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9月下旬正式形成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种势力。中国共产党代表左翼势力，国民党代表右翼势力，中间党派则代表着中间势力。

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路线，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挺进敌后，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从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国民党进行抗战是被迫的，又害怕人民群众，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因而造成国民党战场丧师失地，节节败退。但是应该承认，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其“政策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①；对内，党禁也有所开放，释放了一批所谓政治犯，1938年4月，决定设立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国民参政会，“聘请”各党派和无党派的著名人士担任参政员。国民政府实行这些措施，虽然是被迫的，然而，使当时的党派关系有了一定改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版，第1037页。

中间党派主要有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学会（通称三党三派）。他们的政治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主张抗战到底，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主张发展民众运动，要求有救国言论，救国活动和救国组织的自由；另一方面，又程度不同的、把抗战胜利的希望，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蒋介石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不一，有的反共，有的联共，有的亲共。但是他们“拥蒋抗战”却是基本一致的。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总方针没有改变，但采取了新的政策：把军事进攻的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对国民党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这时蒋介石国民党也就相应地将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

1939年1月，在国民党召开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蒋介石声明“抗战到底”的所谓“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为投降妥协作准备，又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和许多反动法令。这次会议是蒋介石国民党重新走上反动的标志。从此以后，国民党就继续秘密地向省级党、政、军及特务机关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反动文件。4月以后，国民党军队在各地则不断地向共产党挑衅，挑起“摩擦”，他们先后制造了湖南的“平江惨案”、河南的“确山惨案”和其他一系列事件。

国民党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向共产党挑起“军事摩擦”的同时，在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也不断向抗日的中间党派挑起了“政治摩擦”。国民党处理党派关系的基本政策，就是“消灭异党”。当时国民党大造舆论，在他们自己的党报和党刊上，就口

口声声强调所谓“一个党”，言外之意，其他党派是不许存在的。对其他党派出版的图书、杂志、报刊，国民党加强了审查和控制，他们特别忌讳、害怕“党派团结”四个字，不管什么文章，不管用在什么地方，一律改为“党派统一”四个字，以表明中国只许有“一个党”存在。为了达到“消灭异党”的目的，1939年4月国民党秘密制造的所谓《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就明确提出了“以组织对付组织”的原则，并制定了一系列所谓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具体办法。所谓积极方面的具体办法，就是加强国民党对民众团体、机关、学校、工厂的控制，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不断扩大国民党的阵地。针对中间党派活动的重点在文教机关，就特别强调：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公立大中学校教职员，应多派本党党员充任，各公私立大中学校尤应有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与活动，以坚强本党在教育界及学生界之壁垒。为了加强同中间党派对青年的争夺，要求国民党各级党部，“对青年应尽量吸收加入本党或青年团，使它信奉本党主义而努力”，“在本党领导之下从事活动。”所谓消极方面的具体办法，就是加强对其他党派的活动限制和压迫，不断地缩小以至消灭其他党派的阵地。国民党就是靠“吃摩擦饭”过日子的。当时就明确规定：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取严格控制政策，不可放弃职守，纵因此而发生摩擦……亦应无所顾忌。而且，还具体规定：对未向国民党立案的民众团体，应切实取缔，勿稍宽纵；对已立案的民众团体，如发现异党分子，主管党政机关，应令飭所隶属之社团，取消其团员资格，并强制其服务之机关学校或工厂等开除其职务，借以警戒其他分子；对军政机关和学校，非有特殊情形并经呈准者，一概不准擅自延用异党分子。

在上述反动文件的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方面国民党强拉人入党，否则就加以种种压迫，尤其是机关学校的教职员工，一大批一大批实行“集体入党”，使人人在入党和饭

碗之间作出选择，他们以为大家都进入国民党了，“异党”就可以“不消自灭”了；另一方面发现有其他党籍者，就加以种种压迫，轻者打破饭碗，重者就被捕入狱或关在集中营，甚至迫害至死。

国民党主要打击的目标，当然是共产党，其次则是一直被他们看作是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救国会。因此，在这一时期，救国会派的青年学生和职员被迫失学、失业的是很多的。救国会的领导人也遭到种种打击和迫害。举几件事如下：（1）李公朴在1939年6月，组织了抗战建国教育团先后在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进行教育宣传工作。因此，国民党对李公朴在华北敌后的活动十分仇视，妄图予以查禁，并密电朱怀冰如捉到李公朴等，立即就地枪决。虽然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并没有得逞，但是，却说明了他要置李公朴于死地而后快。（2）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十多年来为宣传中国的进步文化和当前抗战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蒋介石却恨之入骨。1939年，国民党以“售卖违禁书刊”、“与共产党延安通消息”等莫须有的罪名，诬陷生活书店，并从3月至6月间，短短3个月，就勒令封闭或停业的分店达11处之多。分店的职工被无理扣押；书籍、财产全被没收，经理纷纷被捕入狱，如西安分店经理周名寰身患肺病，被送入集中营，备受折磨。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傖和副部长潘公展，公开提出要生活书店和国民党的正中书店及独立出版社联合，组织一个总管理处，或成立一个董事会，妄图吞并生活书店。这些事给了邹韬奋在精神上很大的刺激。

此外，国民党对其他抗日党派也不例外，甚至同国民党关系比较密切的青年党，因为它在四川有一定的基础和影响，也受到国民党的妒忌和打击，引起了政治摩擦。当时四川有不少教员是青年党员，被国民党发觉后，即被解职而失业。对此，青年党领导人之一李璜非常愤慨。

总之，随着国民党对日抗战的日趋消极，对内政策的日趋反

动，中间党派和国民党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尖锐。从而就激起了中间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和反抗，推动了他们为争取抗战、团结、民主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斗争。

1939年9月9—18日，国民党政府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在会议前一天（9月8日），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位共产党参政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一文。提出：全中国人民的当前严重任务，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反对中途妥协危险，力求全国团结加强，反对各种分裂阴谋，力求全国向前进步，反对一切倒退现象。会议召开以后，共产党和中间党派的参政员，又共同纷纷提出了许多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提案，其中有陈绍禹（共产党）等26人提出的《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左舜生（青年党）、张君勱（国社党）、章伯钧（第三党）等36人提出的《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江恒源（职教社）等40人提出的《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具五项意见建议请求政府采纳实行案》；张申府（救国会）等21人提出的《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王造时（救国会）等37人提出的《为加强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张君勱、左舜生、章伯钧等55人提出的《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时局案》。这六个提案，概括起来，主要内容如下：

1. 认为当前形势严重地存在着分裂的危机。提案指出，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国各抗日党派继承和发扬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伟大民族传统，“抛弃内争，共抗外敌”，这是我国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因此，加强各抗日党派之间的团结合作，是坚持抗战胜利，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基本保证。提案还指出，目前形势已存在着严重的分裂危机。因为近半年以来，我国各党派间，疑虑增多，纠纷时起，而所谓“异党”问题，则使许多抗日积极

分子，有的受排斥，有的被屠杀暗害，有的被拘捕或被开除职业、学籍等等，这不仅使各党派间的关系日益恶化，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团结的基础，破坏了神圣的抗战事业。目前形势的分裂危机之所以造成，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挑拨离间；另一方面，则由于抗战营垒内，确有一部分人认为日寇已经和缓了灭亡中国的政策，于是就不做坚持抗战的实际工作，甚至有人居然忽视亡国的危险，而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了国内，转移到反共及对国共团结的破坏，对一切进步力量，极力进行打击。因此，当前中国人民的严重任务，就是力求加强全国团结，克服目前严重的分裂危机。

2. 认为当前根本的出路就是结束党治，实施宪政。提案指出，为了克服当前的分裂危机，挽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根本的出路就在于实行彻底的政治改革，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理由是：（1）能从根本上击破敌人的分裂阴谋。提案指出，两年多的抗战已使敌人认识到单靠军事力量，是不能战胜我国的。因而它在政治上加紧了对我国的分化瓦解和挑拨离间。而我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政治制度不仅没有根本改革，反而近来又出现了倒退，出现了政治逆流。这就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提案强调：“敌人利我之分裂，而不利我之统一，利我之摩擦，而不利我之团结……冀我内部发生问题，以便利其侵略野心之实现”，因此我们绝对不能中敌人的奸计。为此，必须注重我国内部的政治改革，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巩固我国内部的团结。只有这样，才能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并从根本上粉碎敌人的分裂和挑拨离间阴谋。（2）能从根本上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利于动员人民抗战。提案指出，抗战两年，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不给人民以充分的民主权利。目前的政府，只对国民党一党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这是不利于全国人民团结，不利于动员人民抗战的。政府应该是全国人民的政府，不是国民党

一党一派的政府。因此，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彻底开放政治，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目前的分裂危机，才能动员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保证抗战的彻底胜利。(3) 能从根本上加强各党派的团结，增强抗战建国的力量。提案指出，抗战以来，各党派团结对外，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下，门户之见很深，对所谓“异党”的活动防范和控制很严。党派间的纠纷摩擦日益增多。长此下去，中国抗战建国的前途，不堪设想。为了巩固党派间的团结，增强抗战力量，必须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办法有两个：第一，由政府授权国民参政会本届大会，推选若干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一个可使全国共同遵守的宪法；第二，于最短期内，颁布宪法，结束党治，全国各党各派一律以平等合法的地位公开活动，消除党派纠纷，共同担负起国家的命运。

3. 克服当前分裂危机的临时措施。正式宪法尚未制定公布前，为了克服目前的分裂危机，必须和立刻执行下列临时紧急措施：(1) 由国民政府明令取消各种所谓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严令禁止藉口所谓“异党”或思想问题，而对人民和青年，实行非法的压迫（如拘捕、杀害、开除职业或学籍等）。(2) 由国民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战党派之合法地位。(3) 为了共赴国难，必须集中人材。“用人但问其才不才，不问其党不党”。在各种抗战工作中，各抗日党派的党员，一律有服务的权利。“政府用人行政，不宜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真正做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4) 在正式的民意机关成立以前，立即成立举国一致的战时行政院，行政院暂时对国民参政会负责。

在共产党中间党派一致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迫于形势，迅速由孔庚等 19 名国民党参政员提出《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虽然这也是一个实施宪政的议案，

只是内容与众不同。他提出要遵照 1935 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公布的国民大会老方案进行筹备。就是说国民大会代表主要是原班人员。宪法也要以“五五宪草”为蓝本。这个提案的实质是要使国民党一党专政，披上宪政的合法外衣。

因此，虽然都提实施宪政，但是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但是，最后国民参政会把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七个实施宪政提案合并审查，作出了决议如下：甲、治本办法（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由议长指定参政人员若干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法。乙、治标办法（一）请政府明令宣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为适应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构应加充实并改进，藉以集中全国各方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争取最后胜利。

对上述决议案应该看到它的两面性。一方面要看到它的进步性，在全国人民和各抗日党派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承认要“实行宪政”，承认全国人民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承认应该“集中全国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等等。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它的根本弱点，是空洞，特别是关于党派关系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提法，被一概抹掉了。条文只提“实行宪政”，不提“结束党治”，只提“全国人民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不提“取消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保障各抗战党派之合法地位”，只提“集中全国人才”，不提“政府用人行政，不宜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等等。为此，当时在讨论议案过程中，出现了以国民党为一方，而以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为另一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国民党认为上述关于党派关系的提法是“不必要”的，各抗战党派则一致认为是“必要”的，应该写到决议中去。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尖锐达到最高峰的辩论，当然要推“结束党治”这一点了。当时的气氛简直白热化了。罗隆基、李璜、徐傅霖等站起来，大呼“一党专政不取消，

一切都是空谈”。但是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国民参政会，这些一针见血、有棱有角的提法是通不过的，只能通过一些抽象化、玲珑化的条文。

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中，和要求实施宪政的提案相呼应的，还有两个提案：一个是沈钧儒等对保障人民权利的再呼吁，一个是邹韬奋等对保障文化事业的再呼吁。

这次国民参政会结束后，为了促进宪政运动的开展，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左舜生等 25 位国民参政员发起召开宪政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了多次，到会者各界都有，人山人海，非常热烈。由于宪政座谈会到会者的多次热烈要求，推选了 85 人，筹备组织宪政促进会。为把宪政运动推向全国，沈钧儒还前往桂林进行宪政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这次宪政运动，由于得到中共各地党组织的积极支持，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延安、西安等地举行了各界的宪政座谈会，成立了各界的宪政促进会，从而在全国各地迅速地掀起了一个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被迫在 11 月召开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出了在 1940 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

就是这样，中间党派以及无党派的领导人，通过国民参政会、民主宪政运动等一系列活动，不但加强了联系，增进了了解，而且在争取抗战民主，实施宪政，结束党治等重大问题上，看法也基本一致，在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上也有所转变。这就为三党三派的联合，在政治上思想上打下了基础，作了一定的准备。

1939 年 10 月间，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准备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三党三派的领导人，为了调解国共纠纷，促进团结，分别在成都、重庆举行了聚会。一致认为，自己人不应该打自己人；应对国共纠纷进行调解，以免分裂，促进团结；要达到上述目的，有组织起来的必要。

同月初，黄炎培、梁漱溟、李璜、晏阳初等在成都举行了聚

会，提出了筹建统一建国同志会的设想。随即回到重庆，取得了沈钧儒、邹韬奋、张澜、章伯钧等人的同意后，便共同为发起筹备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而积极地开展了活动，从10月中旬到11月中的一个多月期间，他们在重庆先后公开地举行了多次集会，进一步联络了中间势力中的民主进步人士；同时组织人起草和修订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11月23日，由黄炎培、沈钧儒、张澜、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等为发起人，召集有关人员，在重庆青年会餐堂举行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大会，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信约》和《简章》，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加入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会员有：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张申府、俞颂华、刘清扬；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问渔、冷遹、杨卫玉；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晏阳初；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胡石清、罗隆基（1942年上半年脱离该党）；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余家菊；无党派人士张澜、光明甫、杨赓陶、周士观等共30人左右。为了取得该会的公开合法地位，还决定由黄炎培、梁漱溟两人会见蒋介石。

会后，黄炎培、梁漱溟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信约》和会员名单托张群和王世杰转送蒋介石审查，并请他们约定与蒋介石会见的日期。11月29日，梁漱溟（因黄炎培已出差泸州）在张群和王世杰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梁漱溟向蒋介石说明了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原因、经过及其主张，要求蒋介石予以承认。蒋介石对名单上有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表示“异议”，经梁漱溟说明后，蒋介石即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而“谅解”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

《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共有十二条。概括起来有下列要求：（1）抗战建国方面，“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拥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对

外抗战，对内建设”，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2）宪政实施方面，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3）党派关系方面，“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4）军事方面，主张“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反对一切内战”，反对“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

《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正确的方面，要求抗战建设，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设施和法令；主张各党派合法平等和尊重思想学术自由等等。这些要求和主张之所以都是合理的，是因为当时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抗日，以解决中日民族矛盾为主，因此上述要求和主张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最基本的要求，有利于抗战，而有利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错误的方面：（1）“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两个口号，是蒋介石用来反共反人民，强化其一党独裁的借口；（2）“力促蒋介石领袖地位之法律化”这等于说，蒋介石是当然领袖，谁都不能反对他，谁反对他，就以“法律”论处；（3）反对一切内战，反对一切暴力斗争，这是不分是非的阶级调和论，实质上是只许蒋介石对共产党发动军事进攻，而不许共产党实行自卫还击；（4）“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其实质是要把共产党领导的一切人民军队交给蒋介石。总之，《信约》提出的上述错误主张，正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既反映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成员没有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对他抱有很大的幻想，也反映了他们根本不了解国共两党纠纷的实质，因而，它的那些错误主张，决不能阻止蒋介石推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对抗战是极为不利的。

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及其十大纲领

中间党派的领导人在建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之后不久，为什么又要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下简称“民主同盟”）？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首先，统一建国同志会是个松散无力的组织。1939年12月—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统一建国同志会曾多次集会，讨论并组织人草拟了一个提案，准备向4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提出，以调解国共两党的纠纷。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一个健全的领导核心，缺乏严密的组庄原则，意见没能统一，这个提案便改由草拟者以个人名义提交给国民参政会。4月下旬，日寇对重庆大轰炸，其成员疏散下乡，活动即告终止，此后，统一建国同志会实际上成了一个不起什么作用的涣散组织。

其次，国民党顽固派在准备发动皖南事变的同时，对中间势力也实行高压政策，横加迫害。5月，何应钦（军政部长）在一次国防最高会议上，造谣说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等，将于“七七”在重庆组织暴动，如不成，双十节再行暴动。随即派出军警特务对他们三人进行监视。邹韬奋在1942年2月24日晚，被迫逃亡香港。10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新疆逮捕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12月24日，重庆各大报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的名单，其名额虽然比上届增加了40名，但是，中间党派在该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额，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所增加的名额全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结果，使得国民参政会成为蒋介石国民党完全能够掌握绝对多数的御用工具，使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唯一能够进行合法斗争的场所受到了更大的限制。

再次，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相反，则积极争取团结中间势